

## 比較優勢、威權政治與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研究

◎ 王文龍

### 一 當前國內對比較優勢與威權政治的爭論

自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對於改革開放戰略得失的爭論就逐漸升溫，並突破「精英」的學術性討論，形成廣泛的社會參與，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林毅夫與楊小凱之爭，郎顧之爭，新蘇州模式之爭，市場換技術戰略之爭，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於兩個問題，一是動態的比較優勢的形成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二是甚麼樣的制度更有助於建立動態的比較優勢，實現經濟趕超？

對於前一個問題的討論有其廣泛的現實背景，作為一個大國，中國過度的對外貿易依存和過度的對外開放已造成了很多問題。一是嚴重影響到國家的經濟安全，使中國容易受到國外經濟波動的影響，成為進口大國轉嫁危機的替罪羊。二是導致民族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低下，產業升級困難，不利於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使各種問題進一步惡化。三是導致貧困化增長，由於產業的趨同，進入門檻低，第三世界國家紛紛進入低端市場，加之低檔商品的需求彈性較低，這就導致嚴重的供求失衡，貿易條件的惡化，陷入貧困化增長。四是過度的開放，對外資的過度優惠與依賴，將形成依附性增長，中國消耗掉大量的資源，勞動力，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後，大部分利潤卻被外資企業或跨國集團所攝取，中國所得甚少，這在蘇州模式，東莞模式中都有體現，如果不改變這種發展模式，中國將陷入經濟上的依附地位，大國崛起就是一個夢想。五是貧困化增長進一步惡化了國內分配問題，使普通勞動者處於更不利地位，擴大了國內貧富差距，激化了社會矛盾，可能導致現代化的夭折。

針對當前中國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和貧困化增長趨勢，國內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些學者和專家從發展經濟學的觀點出發，認為應該採取有效保護措施來改變中國對出口過度的依賴，通過產業政策提高中國民族企業的技術開發能力，促進產業技術升級，優化中國出口產品的貿易條件，創造動態的比較優勢，實現韓國式的趕超發展。另一些學者則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出發，對這種違背靜態比較優勢，反對自由貿易的趕超論十分反感，認為趕超戰略使資源配置不合理、低效，導致經濟發展緩慢，並伴隨大量尋租腐敗，形成特殊利益集團，損害消費者利益，最終形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南美諸國的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就是明鑒。它們認為，中國貿易條件的惡化是暫時的，隨著中國資本、技術的積累，要素稟賦的改變，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會自動完成，貿易條件會自動改善。因此，當前最重要的問題不是實行產業干預政策，而是要進一步深化開放，利用比較優勢，進一步的參與全球分工。兩種觀點都認為中國產業結構升級是必要的，分歧主要是怎樣來實現這種升級，是通過政府干預、產業保護來主動的改變產業結構，還是應該通過比較優勢、自由貿易自動地實現產業升級？

對於後一個問題的討論，則主要集中在對當前威權政府的評價上。隨著經濟的發展，民智的開發，國外思潮的湧入，權威政府的合理性已受到普遍質疑，政治民主化已成為大勢所趨，並且周邊的韓國、新加坡、泰國正在實行政治民主化轉型，中國香港地區已經建立了穩定的民主法制社會，認為儒家文化和民主化不相容的謬論已經被破除，另外，世界上那些富裕發達的國家也無一不是民主法制國家。再反觀國內，由於權力的過分集中，人治的長期存在，導致尋租、權利壟斷和金權勾結的普遍化，腐敗問題日益嚴重，國內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已嚴重影響到社會穩定，權威政府的合理性不斷地受到質疑，要求加快政治民主化的呼聲在不斷高漲。然而奇怪的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在極力鼓吹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的同時，卻並不認為政治民主有其必要性，反而極力強調中國問題的特殊性！認為中國要實現趕超戰略，就必須走漸進化改革之路，威權政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還有其合法性，並不斷的強調東亞模式的特殊性，認為威權政治是東亞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國要實現趕超戰略，也必須在一定時期內實行威權政治。它們還不斷的就中國的漸進式改革與俄羅斯休克療法、中國的權威市場制與印度的民主市場制經濟績效進行對比，強調在經濟比較落後階段，集權政治有其必要性，腐敗損失相對於集權收益來說是次要的，貧富差距擴大與腐敗無關。

那麼，比較優勢真的會自動促進中國產業升級，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嗎？威權政治是實現趕超式發展的必要條件嗎？

## 二 動態的比較優勢必須通過政府積極干預才能形成

比較優勢理論是自由貿易理論的基礎，也是各種發展戰略的理論基礎，比較優勢理論有兩種，一種是靜態的比較優勢論，無論是絕對優勢論、比較優勢論，還是要素稟賦論，都是靜態的比較優勢理論。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認為，只要兩國在商品生產中生產率存在著相對差異，各國就可以通過生產各自有比較優勢生產率的产品，進行國際貿易，在貿易中，各國都可以獲得福利的增加，因此，依照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進行國際貿易，是一種理性的選擇。要素稟賦論則進一步從各國不同的要素稟賦入手，認為各國應該充分利用自己擁有的優勢資源來生產商品，通過國際貿易，各種要素的價格將最終實現均等，這就暗示落後國家應該依照自己國家的資源稟賦進行國際分工，通過國際貿易，最終實現與先發國家均等的要素報酬，拉平與先發國家的收入差距。雷布辛斯基定律則進一步認為通過國際貿易，落後國家可以不斷積累資本，從而改變自己的資源稟賦狀況，自動地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無論是比較優勢論，要素稟賦論、還是雷布辛斯基定律，都認為自由貿易是一種雙贏現象，自由貿易是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另外一種是動態的比較優勢論，該理論認為比較優勢是可以創造的，如果不主動創造比較優勢，就會一直處於後發劣勢狀態，受到馬太效應支配，在財富分配中永遠處於不利地位。首先提出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是德國歷史學派的創始人弗裏德里希·李斯特，它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體系》中對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嚴厲批評，它認為，由於各國分工不同，那些處於產業鏈高端的發達國家就可以壟斷市場，使處於產業鏈低端的國家處於交換的不利地位，因此，落後國家必須實現工業化，打破發達國家對高端產業的壟斷，才能獲得公平的貿易地位，合理地分配貿易利益。而要實現工業化，就必須改變資源的配置，市場經濟只注重短期的配置利益，固化已有的不合理國際分工，自由貿易會扼殺幼稚的民族產業，固化落後的產業結構。因此，李斯特強調了幼稚產業保護的重要性，有限貿易保護的必要性，認為要實現產業結構升級，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國家制度創新和合理干預十分必要。李斯特的理論後來受到後發國家發展經濟學家的普遍重視，並被普雷維什的貿易條件惡化論

和巴格瓦蒂的貧困化增長進一步完善，成為二戰後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戰略的理論基礎。另外一個動態的比較優勢理論應該是弗農的產品週期理論，該理論認為，產品在不同生產階段處於不同的資源聚集狀況，需要不同的生產模式，要求在不同的國家生產。

因此，當前看一個國家商品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再是看一個國家生產甚麼，而是應該看該產品所處的生命週期，也就是說，不在於生產甚麼，而在於用甚麼技術來生產！現在一些國家接受一些發達國家轉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就以為改變了自己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哪只能是一種幻想，只有擁有自主的技術開發能力，落後國家才能改變自己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改變自己的貿易條件。新貿易理論則更強調國家對戰略性產業保護的必要性，該貿易理論認為，現代知識密集、資本密集型企業規模龐大，投資巨大，資本回收週期長，如果讓市場來進行資源配置的話，私人企業一般不會進行投資，但一旦這些企業形成生產力，就會產生規模經濟，邊際收益遞增，產生很強的國際競爭力，有的還會有很大正外部性，再如果市場非常有限，該企業還可能會獲得壟斷地位，取得壟斷利潤。因此，新貿易理論鼓勵政府積極地扶植一些規模經濟和正外部性明顯的戰略性產業，以獲得先佔優勢和競爭優勢。

一般來說，靜態的比較優勢理論都主張自由貿易，市場調節，反對保護貿易和國家干預，要求維持國際分工現狀，讓市場自動調節產業結構，認為自由貿易可以逐漸縮小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動態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產業升級不會自動發生，自由貿易的結果是馬太效應，因此，要改變自己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就必須實行有限貿易保護，促進產業升級；它們認為市場調節只關注短期利益，為了國家長期利益的實現，適度的國家干預十分必要，只有通過積極的國家干預才能夠擺脫馬太效應，創造動態的比較優勢。

從歷史發展實踐來看，那些僅遵循靜態的比較優勢參入國際分工，實行自由貿易的後發國家一般來說都（石油等少數戰略資源擁有國除外）長期面臨著貿易條件惡化和貧困化增長的厄運，它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在不斷擴大。在自由貿易中，它們的產業結構不但沒有改善，反而由於對出口產業的過度投資，形成大量沉澱資本，處於一種資源鎖定狀態，因此，在供及上就缺乏彈性，導致貿易價格的劇烈波動，使經濟的依附性發展加深，這在那些拉丁美洲的香蕉共和國和非洲一些可可生產國十分明顯。而那些後發成功的國家一般會推行長期的產業政策，積極的進行政府干預，實行有限的貿易保護，積極的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不斷提高自己的技術水準，努力改變自己的要素稟賦，改善貿易條件，最終實現趕超。無論是二戰前的德國、日本，還是二戰後崛起的韓國、新加坡莫不如此。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國內外主流經濟學家紛紛從新自由主義角度對韓國和中國台灣進行了比較，認為韓國政府的過度干預，大量投資於自己並沒有比較優勢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導致資源配置低效，產業競爭力降低，使其經濟績效低於中國台灣，導致外債大增，國家破產。台灣政府則在提供基本的基礎設施之後，讓企業自己根據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電子加工工業，促進了經濟的良性發展，抵禦了東南亞金融危機。

因此，主流經濟學家進一步得出結論，主動地干預產業，企圖創造新比較優勢的做法是要不得的，它只能適得其反，破壞資源配置效率，並就三星與台積電進行對比，對台積電充分利用比較優勢讚賞有加。然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過去十年後我們再回首，得出的結論可能恰恰相反，韓國的工業潛力遠遠高於中國台灣！台積電、明基、華碩等等，永遠只能充當二流腳色，只有三星才可以挑戰索尼的領頭地位，而且，韓國的汽車，核能發電，造船，鋼鐵都擠身世界前列，在中國台灣，電子組裝業由於技術含量低，大批國家的加入，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產業的過度單一化蘊藏著巨大的風險，使台灣經濟不斷惡化，在四小龍中墊底。因此，只有那些積極主動地創造新比較優勢，捨棄短期的比較利益，贏得長期比較利益的國

家，才能不斷改善貿易條件，實現趕超目標。

當然，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的拉美諸國政府也進行了積極的干預，希望改變自己的貿易條件，但卻造成了發展的危機，對此我認為並非干預之錯，而是政府失靈和干預不當之錯。雖然，後發國家積極干預產業發展的並不一定都成功，但是，那些沒有積極干預的後發國家則幾乎沒有成功的。就是發達國家，美國政府也正在構築資訊高速公路，韓國政府正在推進金橋計畫，歐洲正在合力推動伽利略計畫，期望佔領戰略制高點，贏得未來競爭優勢！

### 三 威權政治已不再是後發戰略成功的必要條件

對於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我們一般是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得出發展規律的，通過對有代表性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我們現在一般認為有兩種成功的現代化發展模式，一種是先發國家的漸進式現代化模式，一種是後發成功國家的趕超式現代化模式，每一種模式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需要具備一定的歷史條件。先發國家的工業化是一個漫長而漸進的過程，產業結構的升級是自發的，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基本同步，由於在發展中有先發優勢，處於國際貿易的有利地位，所以一般主張自由貿易，產業發展和資源配置主要依靠市場調節，一般遵循先農業發展，再到輕工業發展，後到重化工業發展，資訊產業發展這樣一個自然的過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這些國家上層建築也發生相應的變革，民主與法制逐漸完善，在工業化過程中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一般較小，這種發展模式可以稱為漸進的平衡發展模式，遵循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社會控制主要通過民主與法制來規範。這種模式的一個基本缺點是市場失靈比較嚴重，經濟危機不斷爆發，但經過凱恩斯革命以後，政府的宏觀調控使市場失靈問題得到一定程度控制，雖然市場與政府的關係處理的還不是很理想，但就當前世界來說，這已經是最完美的制度組合，它最大限度的避免了政府和市場失靈。但是，西方漸進式的平衡發展對後發國家來說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因為，發展的條件相差太大，發展時間太長，落後國家難以施行，因此，後發國家一般把目光投向與其國情相似的後發成功國家，進行戰略模仿。

後發成功國家一般採取趕超式發展戰略，通過權威政府的各種干預政策，積極引導資源投向政府預定的發展產業，以糾正市場失靈；通過有限的貿易保護，促使幼稚產業的發展與壯大，並通過不斷的產業升級，改變自己的不利貿易地位，取得趕超式的發展。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準，產業具備競爭力以後，再逐漸擴大該產業的開放度，進入下一輪的產業干預與升級。同時，根據經濟的不斷發展，對政治體制進行不斷的變革，擴大民主，完善法制，最終實現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現代化。無論是二戰前趕超成功的德國、日本，還是二戰後崛起的韓國，都是實行這種權威政府推動下的不平衡發展戰略，通過威權政府來糾正市場的短期行為，實現產業結構的不斷動態優化，最終完成現代化。雖然，權威政府的路徑依賴也留下了不少政治轉型的後遺症，使這些國家後來的發展走了不少彎路，但從總體來看，它們的趕超戰略還是比較成功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個強有力的權威政府在趕超戰略中十分重要，它有效的糾正了市場失靈，彌補了市場不完善的缺陷。然而，對這個權威政府也有嚴格的要求，它首先自己不能失靈，否則，一個失靈的政府來糾正一個失靈的市場，導致雙重失靈，只會使問題更糟。按照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政府作為經濟人組成的機構，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必須通過一定的措施來防止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儘量減少政府官員的尋租和腐敗。

一般來說，約束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有兩種方法，一是西方式的民主法制制度約束，這種約



束是硬約束。另一種是文化與傳統約束，這是一種軟約束，雖然不穩定，但效果很好。對於後發成功的這些國家來說，威權政治決定了其民主法制制度不健全，文化與傳統信念所組成的社會資本起了很大約束作用。這些文化與信念不僅約束了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阻止了官員的尋租，而且激發了國民的獻身精神。一般認為，防止德國、日本、韓國政府在趕超過程中政府失靈是其悠久的民族歷史、強烈的民族主義、濃厚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較小的國內階層分化、精英政治的歷史合法性與合理性。這些因素保證了這些國家較高的國民凝聚力，約束了政府的尋租行為，使政府的動員能力達到最高，有效地減少了市場失靈的惡果。當然，後發成功國家之所以能夠發展成功，除了其獨特的社會資本外，其相對有利的趕超條件和國際環境，以及及時的戰略轉型也都十分重要！

然而，促使後發國家發展成功的國內外條件，對於今天的絕大部分國家來說已不復存在。當前的後發國家的工業化正面臨著全球性的能源危機和環境危機，出口市場競爭十分激烈，需求約束十分嚴重，而且長期的殖民統治所造成的依附性產業結構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後發國家經歷過長期的殖民統治，造成了後發國家內部的進一步分裂，使同質化的社會瓦解，在外部殖民的同時又形成了內部殖民，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國家獨立後，它們的殖民遺產並沒有像韓國一樣遭到清算，各種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依然保留，殖民者退出後的權利真空導致各種矛盾不斷爆發出來，各利益集團相互傾軋，過多的內耗損害了國家的發展潛力，使個人利益，集團利益或部族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為了集團的短期利益而損害了國家的長遠發展。另外，長期的殖民統治還造成了本土文化的瓦解，殖民主義者不僅通過階層分割瓦解了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造成殖民地內部嚴重的衝突，而且通過其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文化來消解後發國家的集體主義和勤奮精神，造成國民普遍的短期化行為和資本積累的嚴重不足，削弱了其工業化的能力，更嚴重的是，西方意識形態造成的集體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的瓦解，使後發國家難以形成國民凝聚力，在民主法制不完備的情況下，文化軟約束的消失就使政府完全失去約束，腐敗和尋租十分普遍，政府失靈十分嚴重，在這種背景下，再盲目地模仿趕超模式，實行威權政治，必然導致雙重失靈，導致發展的失敗！

由於傳統的趕超戰略已不可模仿，如何防止雙重失靈便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問題，西方成熟的宏觀調控加民主市場經濟雖然可以把雙重失靈發生的機會減到最少，但這是它們長期進化的結果，後發國家難以模仿。在所有國家，市場失靈都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沒有一個硬政府，市場失靈就難以糾正，因此，後發國家首先的問題應該是解決政府失靈問題。要減少政府失靈，一種是制度建設，一種是文化建設，當然，兩種結合更好。但是，對於絕大部分後發國家來說，這兩種手段都不具備。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的霸權下，估計在長時間內，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還是世界價值觀的主流，而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民族主義已幾乎成為一個貶義詞，國家主義也被不斷消解，這樣，想要再通過集體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激情來提高民族凝聚力，約束政府尋租已不可能，因此，要減少政府失靈，唯一之途就是加強制度建設，通過民主憲政來約束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然後，再用這個高效、廉潔的政府糾正市場失靈，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當然，這需要長期的過程，在最優選擇傳統趕超戰略已不可行的情況下，民主憲政作為次優的選擇或許就是後發國家最好的選擇，因此，對於今天的後發國家來說，威權政府已不再是趕超戰略的必要條件，民主憲政才是其當前的最緊迫需要。

#### 四 進一步完善民主法制，重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

應該說，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追隨東亞模式，取得今天這樣驕人的發展成就，威權政

治的作用不可忽視，在改革初期中國市場體系極端不完善的背景下，威權政府通過自己的宏觀調控進行了比較有效的資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市場失靈，促進了經濟發展。威權政治在中國開放的早期階段能取得這樣的成果，沒有出現大量的尋租，這是和毛澤東留下的歷史遺產分不開的（巨額國有資產的分割對分配的緩衝作用十分重要）。毛則東時代雖然有不少失誤，但正是這個時代，我們國家徹底的消滅了殖民地半殖民對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的扭曲，形成了相對公平的社會，建立了相對完備的工業體系，使階層衝突減到最少，集體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意識空前高漲。在制度極其不完善的改革初期階段，這些有利的社會資本有力的制約了尋租行為，保證了政府的相對廉潔、有效。然而，隨著市場經濟對集體主義的瓦解，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激情的消退，文化、意識形態的軟約束越來越小，而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滯後又使硬約束跟不上，導致機會主義的氾濫，腐敗尋租的普遍化，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相互交織，惡化了發展環境，加劇了社會衝突。針對這種日益拉美化的局面，國內有兩種呼聲，一種是要求進一步集權，實行精英政治，讓精英控制尋租，另一種則要求逐步實現民主憲政，對政府進行硬約束。應該說，當前的問題不是集權不夠的問題，而是權利缺乏監督的問題，只要是人治，就存在尋租的可能，只有用權利來制約權利，用法制來限制權力，才能約束官員的機會主義行為，更大的權利只可能導致更多的腐敗。

因此，當前中國最急迫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然而，對於政治體制改革，國內一些既得利益階層總是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不斷加以阻撓，似乎改革就會破壞穩定，政治改革和社會穩定是一對尖銳矛盾。實際上，任何有一些民族責任感的人都能看到，當前中國政府失靈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不加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才真有可能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一方面，政府由於缺乏監督機制，人治問題普遍，導致腐敗嚴重、權利壟斷和行業壟斷問題惡化、社會分配不均、機會不均等問題突出，快達到老百姓的承受極限，已嚴重地影響社會穩定。另一方面，由於威權政治失去制度與文化的制約，造成嚴重的政府失靈，用失靈的政府來糾正失靈的市場，已經造成政府與市場的雙重失靈，使宏觀調控難以實現，反而使問題進一步激化，嚴重影響經濟的健康發展，導致醫改失敗、教改失敗、房改失敗、股改失敗。只有加速政治體制改革，儘快建立民主憲政體制，才能減少政府失靈，糾正市場失靈，為改革創造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為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改革的核心內容是民主與法制，但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只注重法制建設，忽視了制度建設，避重就輕，這是不對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礎，沒有民主，沒有監督，法制就失去它的效力，因此，在推進法制建設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充實、完善民主，讓法制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雖然，改革開放後，我們的政治改革也取得了很大進展，但基本上是打打周邊，核心問題分權與制衡基本沒有觸動！當然，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還會受到各既得利益階層的阻撓，但是，主動的改革總被被動的改革好，中國當前的嚴峻社會、經濟形勢要求精英階層必須以民族、國家利益為重，放棄一己之私，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進一步推進民主與法制建設，否則，一味延誤下去，將導致不可逆轉的嚴重後果！

另外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是經濟發展戰略選擇問題，主要體現在短視的市場換技術戰略和蘇南模式式的開放上。市場換技術說白了就是被動的接受國際分工，被動的接受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想用市場換來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那基本是不太可能，在當今社會，技術是企業的生命，也是一個國家競爭力之所在，它決定了一個企業和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和貿易利益分配，喪失了技術優勢，企業就喪失了自己的競爭力，我想，經歷過幾百年市場經濟歷練的老外不會不知道這些道理。我們想要換技術的物件是國外那些大企業、跨國集團，很顯然，它們之所以能做大，能長期壟斷市場，必然有長遠眼光，不會為短期利益所蒙蔽，否則它們也不能做大，沒有技術就會喪失市場，而只要有技術，就可以佔領市場，因此，跨國公

司是不會真的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的，拿自己的核心技術來交換。因此，可以預見，我們在喪失掉大量國內市場後，換來的多是別人的淘汰技術，並使自己的技術開發處於依附地位，進一步喪失趕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國內市場的喪失，卻完全扼殺了民族企業的發展機會，因為作為幼稚產業，民族企業需要一段時間的成長過程，需要一定規模的市場才能達到規模經濟，具有競爭力，才能有資本積累進行技術開發，贏得持續發展的能力。然而，過快的、過廣地開放國內市場，使幼稚的民族企業喪失成長的機會，市場佔有率不斷萎縮，規模經濟難以形成，利潤不斷減少，技術開發缺乏資金，導致競爭力的進一步衰退，最終，或破產，或被跨國集團吞併。市場換技術的結果使中國進一步喪失自主技術開發能力，而喪失技術能力就會進一步失去市場，只能被動的接受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處於產業鏈的低端，辛苦的「為世界打工」！

對於新蘇南模式，國內批評者有之，讚揚者有之，就我看來，這依然是靜態的比較優勢論分工論使然。雖然，蘇州的人均GDP已居長三角第一，然而，在高產值的背後，是蘇州人均收入一直處於溫州、台州、紹興之後，要知道，蘇州被稱為世界第六大砂穀，而溫台地區不過生產傳統的小商品而已！那麼，是甚麼原因使生產大量現代產品的蘇州人均收入並不比生產鈕扣的溫州人高呢？答案只有一個：蘇州的組裝工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處於技術鏈低端！只要蘇州工業一直處於產業技術的低端，處於弗農的產品生命週期理論的第三階段，它就永遠處於不利的分配地位！

因此，認為靠市場換技術或引進外資這種被動的產業轉移就可以改變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的，改變中國在貿易利益分配中的不利地位是不對的。要實現趕超式的發展，我們就必須放棄短期的資源配置觀，樹立長期的效率觀，依靠主動的產業政策來提高中國民族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不斷獲得動態的比較優勢。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只有擺脫新自由主義模式和東亞模式的束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依據自己的實際國情來制定適合自己的發展戰略，摒除對威權政治和自由貿易的迷信，儘快建立民主憲政體制，在減少政府失靈的基礎上，實行積極的產業政策，不斷的創造動態的比較優勢，才能真正的實現強國之夢！！

#### 參考資料

楊小凱：〈經濟發展中的後發優勢與劣勢〉（2000），載新浪網：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1023/15521102730.shtml>。

林毅夫：〈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2002），載  
<http://news.163.com/40715/9/0RAQCQKD00011211.html>。

王文龍：〈後發劣勢：對後發國家發展戰略的深層思考〉，《經濟問題》2007年第4期。

王文龍 湖北紅安人，河海大學商學院在讀博士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五期 2007年8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五期（2007年8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